



CHINA RESTORED

THE MIDDLE KINGDOM LOOKS TO 2020 AND BEYOND

中国预言

2020年及以后的中央王国

[美] 埃里克·安德森 著
葛雪蕾 洪漫 李莎 译



对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正面回应

新 华 出 版 社



CHINA RESTORED

THE MIDDLE KINGDOM LOOKS TO 2020 AND BEYOND

中国预言

2020年及以后的中央王国

——
「美」埃里克·安德森 著
葛雪蕾 洪漫 李莎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预言: 2020 年及以后的中央王国 / (美) 安德森著; 葛雪蕾, 洪漫, 李莎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11 - 9521 - 3

I. ①中… II. ①安…②葛…③洪…④李… III. ①发展战略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190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0 - 6983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China Restored: The Middle Kingdom Looks to 2020 and Beyond, by Eric C. Anderso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raeger, an imprint of ABC - CLIO, LLC, Santa Barbara, CA, USA.

Copyright© 2010 by Eric C. Anderson.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ABC - CLIO,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预言——2020 年及以后的中央王国

作 者: [美] 埃里克·安德森

译 者: 葛雪蕾、洪漫、李莎

责任编辑: 张 敬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1 - 9521 - 3

定 价: 35.00 元

温馨提示: 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 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 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 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 -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 - 63073969

前 言

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平内外，所以限也。

——石介

《中国论》

1040 年

在全球舞台上，中国已经“成年”。1988 年的夏季奥运会预示着韩国走上国际舞台。同样，2008 年的夏季奥运会也已经作为中国重新登上世界中心舞台的时刻铭记在人们心中。美国企业早就作出了这样的预言，美国学者和政界人士却持保留态度。我们检视最近围绕中国的未来展开的学术和政策争论就会发现，说到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北京今后 10 年的目标以及所有这一切对华盛顿的影响时，人们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有些参与讨论的人士认为，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应对威胁到国家生存的人口、经济、政治和安全挑战。看法相反的一派则称，中国是个日渐崛起的巨人——该国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可能会在 2025 年超过美国。

我认为中国的未来极有可能处于这两极之间。中国共产党不会离开舞台，但中国领导人会逐渐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指定由谁陪伴他们起舞。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打算延续邓小平的经济奇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领导人意图把国家重新打造为“中央王国”。

这个目标不像上述称谓所显示的那样危险，但也并非全然是宽仁温和的。我们不应该把中国的中央王国构想与莫斯科重现苏联“荣光”的昭彰企图混为一谈。北京并不抱有打造帝国辉煌的妄想。相反，我会说明中国的政治家是务实派。他们谋求重新打造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力范围。就这一点而论，我赞同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意见。他认为：“中国很可能会试图像美国支配西半球那样支配亚洲。具体说来，中国会极力扩大本国与邻国的实力差距……确保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如同米尔斯海默一样，我也认为北京不打算参加领土争夺战——相反，中国只想像华盛顿在美洲所做的那样，在亚洲范围内制定行为规范。

我之所以致力于从中央王国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未来，并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出于主观臆断。我是在认真研读中国和国际学者、记者及官方的研究成果之后得出这个结论的。从某些意义上讲，中国领导人投入的是一场非常现代的扭转历史的战斗。他们一心要抹去“屈辱世纪”的最后残余，重新在世界大国当中获得受人尊敬的地位。不过，北京显然无意参加争夺全球支配地位的竞赛。尽管中国为取得区域支配地位而展开的活动有时显得很危险，像是与美国展开了世界范围的直接对抗，但我认为这只是西方的看法，是误判了中国的意图。

这不是为了消除华盛顿的顾虑，也不是为了贬损北京的成就。此处真正的关键是，区分为实现区域抱负和发展而开展的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球影响。在卫星通信、制造业外包和能源及资源价格节节攀升的世界里，中国必须打破本国和亚洲的界限，才能确保实现不那么宏伟的目标。由于这个缘故，北京不得不探索外部空间，加强与非洲、中东和

南美国家政府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全球活动并不是为了达到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而是一个想要恢复昔日辉煌的国家为获得中央王国的相应地位而产生的行为。

历史决定的抱负

按照原有的古代文字，中国的字面意思是“中央之国”或“中央王国”。这个自封的称谓当然绝不谦恭，很能说明中国人对自身以及他们所栖息的领地的看法。对中国老百姓而言，中国不仅仅是随处可见的地图上勾画出的政治分界线。中国象征着数千年的文化、经济、军事和政治经验及学识。因此，人们认为中国一度取得了应有的地位，成为了认知世界的中心——也就是“居天地之中”。许多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的两千年间，只有清朝后期的皇帝及其最后几位继任者统治的中国没有达到这样显赫的地位。

日益兴起的欧洲、亚洲和美洲大国展开殖民扩张，加上清朝未能实现现代化，最终导致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衰落。

不过，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最古老的持续性文明。这种衰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超强实力和重要性。在西方和日本“蛮夷”手中遭受的屈辱并未抹灭中国的荣光，而只不过使北京处于一种暂时失去活力的状态。只有国内外政界人士看似漫无目的的举动短暂打扰过中国的长久沉睡。

围绕毛泽东在国内的错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在冷战中的位置（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人们已经著述甚多。就目前而言，我更想了解中国在卷入现代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的世界。如果想讨论重现的中央王国，就必须回过头来研究中国在19世纪之前的“国际关系”。

可敬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Fairbank）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外交政策目标具有如下鲜明特征：

1. 中国历来显示出对区域“支配地位”的偏爱。
2. 这种“支配地位”的基础是显示中国的“优越性”并获得相应的尊重。
3. 中国显然借助这种“优越性”，来推广和睦共处。

中国的首要政治目标是保护自身不受内陆亚洲的威胁。内陆亚洲是指长城以北和以西的广阔地带，包括今天的蒙古、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中国一直认为，长城是“野蛮”游牧民族与文明/有教养世界的分界线。除了极少数例外，“文明人”都生活在长城的中国一侧。国门以外的军事冒险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击退新出现的威胁和降伏出现麻烦的地区。即便这些冒险行动也与西方的“圣战”和战争有着显著不同，因为“文明的”中国人通常会避免实施封建统治，而更愿意让这些国家成为自行管理内部事务的“朝贡国”。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就是接受并承认中国皇帝的政权。

说到对“已知世界”的这种广泛统治，真正引人关注的特点是中國显然无意扩大疆土。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选择固守自己的领土，并不谋求占领遥远的异国土地。事实上，中国在东亚确立毫无争议的霸权地位后，皇帝们似乎就认为没有必要展开更大规模的攻城掠地的行动了。

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人没有实施军事统治，而是试图通过文化、教育和“天启”来扩大影响。朝贡国接受了儒家价值观，从而投入了中国的怀抱。这种文化使得中国在政治等级体系中的最高地位获得广泛承认。或者，也许是中国古代学者和一些当代西方学者想要让我们相信这一点。事实上，真相与儒家荣耀的愿景关系不大，而是更多地基于政治和经济现实。

如今，学者们大多认为，中国通过动用广泛的国家实力来维系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古代的儒家学者可能很想相信，“蛮夷”承认皇帝是天地之间的媒介，但皇室内部的决策者通常比较务实。对这些“现实主义者”来说，关于等级关系的儒家理论只不过是一种迷思，目的是维护皇帝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最高地位的正当性。这些理论和传说在长城以外毫无意义。相反，我们发现中国人为实现外交政策目标而采取了一些比较传统的手法。这当中包括：军事远征、缔结同盟、外交出访，还有贸易。

正是这种贸易手法（尤其是在“朝贡体系”内部）促使一些西方学者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能说服外人接受皇帝乃至中国的固有优越性。事实上，真相并非那么令人赞赏。除了常规的商业交易之外，

中国的对外贸易采取了另一种重要形式……“朝贡”贸易，也就是交换礼品。外国统治者派遣朝贡使团前往中国的朝廷，中国人会拿出一定数量的本国产品，以换取外国的贡品，双方都有所得。对外国来说，主要动机是经济利益。在他们看来，对华贸易利润丰厚，大大超过了他们在表面上承认中国的优越性所需付出的代价。

那么，从根本上看，中国的“朝贡制度”只不过是购买贸易权。长城以外的国家拿出必要的礼物并作出象征性的承认；作为交换，中国则提供利润丰厚的经营权。

这种朝贡制度由此确保了国内对皇帝的忠诚（无论如何，外国人“清楚地知道”他的优越性），还通过确立经济关系来“影响”邻国。

学者们发现这种“朝贡制度”在长城以外获得运用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位日本学者发表了若干篇文章认为，“朝贡制度”在几个层面上得到实施。比较具体地说，他发现许多向中国进贡的国家也相应地要求

自己的邻国进贡。因此，朝贡制度有助于在亚洲各地建立松散的政治一体化联邦——以中国为圆心的多个同心圆。

也许费正清最为准确地概括了从内政到对外关系的整个进程。他写道：“……朝贡仪式所体现的皇权至上原则具有多种用途。如果可以动用武力，就依靠武力；如果中国缺乏实力，可以依靠对中国实力的追忆；或者，也可以单纯依靠贸易的吸引力。”最终的产物是一个松散的国家同盟，有着获得广泛承认的单一权力中心。这是一种不易复制和保持的现象。想想看，比如苏联就无法通过《华沙条约》来成功地仿效这种关系，华盛顿至今仍极力想要与拉美或南美形成这样的关系。无论如何，这种“朝贡制度”及其在内政方面的好处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不复存在。我现在认为，它即将重现。

步入未来

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及邓小平关于国家经济复兴的雄心壮志，重新引发了关于北京终极意图的学术争论。有些学者认为，邓小平试探性的初步举措只是一场构想不周的运动，目的是使中国摆脱贫困。其他西方分析人士则对邓小平的工作作出了不那么善意的解释。例如，一位美国学者 1983 年写道：

……1982 年，中国的内政外交出现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更加独立和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姿态。北京刻意调整到了与美国和苏联的距离比较均衡的外交立场上……对第三世界的外交友好姿态也有所增加。

没有阐明的结论是，中国准备迎接多极世界，也就是一个不存在两

种敌对意识形态或单一霸权的国际共同体。

然而，中国明显缺乏可以彰显的国力，所以北京陷入了看似无穷无尽的等待。随着苏联解体，北京创造国内“经济奇迹”，人民解放军脱胎换骨，中国在成为可敬的国际社会成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从总体来看，中国领导人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证明民族自豪感再度高涨。《丑陋的中国人》旨在揭示中国腐朽的文化基础。此类出版物体现了为理解身为中国人的含义而付出的努力。

就在中国知识分子极力遣词造句，讲述如何中国摆脱了百年屈辱的同时，北京的政界人士正在为更加宏伟的雄心壮志奠定基础。1992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立法，宣布中国对东海和南海上的有争议领土拥有毋庸置疑的主权。此外，该立法宣布中国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和制止对领海的非无害通过”，以及让人民解放军的“军用船舶、军用航空器……行使”紧追权。一位西方学者后来指出，中国随后的行动表明，“通过该立法并不完全是出于内政考虑。例如，1992年5月，北京批准在（一处）有争议的地区开采石油”。

我们也许有必要把1992年的这项立法视作邓小平远大构想的文字版本。除了力促中国经济复兴之外，邓小平还在20世纪90年代宣布了后来所谓的“24字箴言”。他的“24字箴言”指示中国的外交和军事机构“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这种新战略预示着中央王国将东山再起，亚洲即将“出现”一股支配力量。这个国家会尽可能地增加未来的发展选择，但会避免不必要的挑衅，躲避过于沉重的国际负担，在长期内增强中国的实力。

这种兼顾经济、军事和政治议程的谨慎态度并非没有引起国内外的注意。1996年，一批年轻的中国作者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这是一本攻击性很强的书，但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可想而知的是，随着中国人“重新发现”自己，世界其他国家也加入了“发现”中国的进程。1993年，《外交》杂志刊登了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中

文名“纪思道”)的文章《中国的崛起》。这是该杂志在此后数年间鼓励展开的持续对话的开篇。不过,这些早期文章其实都没有回答如下问题:北京最终将走向何方?事实上,有些西方分析人士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的东山再起嗤之以鼻。这种情绪在 1999 年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外交》杂志刊登了杰拉尔德·西格尔(Gerald Segal)的《中国重要吗》一文。

事实上,从许多层面上看,中国确实很重要。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看看裴敏欣(Minxin Pei)如何看待崛起的中国对西方造成的战略影响。作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的高级客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北京的崛起将难以掌控,因为:

1. 尽管中国在经济改革和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它仍然保持着特殊的政治体制,其领导人郑重声明将绝不会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2. 北京的世界观始终扎根于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是个等级分明的存在,各国在展开实力和影响力的竞争,只有具备实力和影响力才能加强安全。
3. 中国的民族主义引起了外部世界的恐惧和猜疑,它同时还助长了排外的情绪。

这是一种可怕的预测,但却证明了一个论点——如果华盛顿忽视北京,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尽管出现了裴敏欣等反对者,但时至 2003 年,一些学者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不会试图独自出击。哈佛大学“‘世界事务中的中国’莱恩讲座”教授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北京其实是国际社会中的既定成员。约翰斯顿检视中国在 4 项重大国际“规制(主权、自由贸易、军

控和民族自决)”方面的记录后发现，北京确立的外交政策与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固有成员奉行的政策极为相似。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北京有理由维护现有国际体系。

2005年，美国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的负责人戴维·香博（David Shambaugh）把这个论点推进了一步。他写道：“亚洲国际关系的传统支柱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崛起是主要原因之一。”香博随后列举了该地区的其他变革因素，其中包括：

- 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和权威相对衰退。
- 东南亚国家联盟日益扩大的规范化影响和区域机构的增加。
- 整个地区的技术和经济相互依存性增强。
- 一些原本对抗性的双边关系出现改善（尤其是日本与中国）。

香博认为，这些变化为北京创造了新的区域态势。北京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引发了猜疑、孤立主义和敌意。如今，我们发现中国打算在远东发挥领导作用。原因何在？香博认为，“中国兴起”（China Emerging）可以归结为4个因素：（1）北京参加了区域组织；（2）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了双边关系；（3）区域经济关系的扩展；（4）安全领域的猜忌和焦虑情绪有所减弱。

这并不是说，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安全领域“安然无忧”。香博想要让我们相信，北京的军事现代化是为了打造一支与自己的国际新地位相匹配的军队，也是为了保持吓阻台湾独立所必需的能力，但他承认，这些动机未能打消邻国的顾虑。香博指出，军事方面有两个问题令亚洲的其他地区感到格外不安——（1）北京在发展军事投射能力；（2）动用这支军队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这两种不安都不可能通过

承诺或否认的方式予以消除。尽管中国宣称“和平崛起”，但中国的亚洲邻国仍然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感到担心。

说到这里，我要明确几个词的含义。按照此处的用法，“帝国”是指西方的一种统治概念。也就是说，帝国是负责统治广阔领土的单一政治单位，这些领土包括殖民地或受到军事和政治征服的类似属地。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央王国东山再起，那么这将为邻国提供中国的“点化和指引”，但不会支持“帝国”的愿望。中国的邻国将获准继续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下去。不过，他们要向北京朝贡，也就是承认中国凌驾于区域联盟和组织之上的“应有地位”。

这显然会引发灾难。我们怎么知道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否会变成被迫承认中国的角色？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学者们已经开始公开加以讨论。在谋求应对这些忧虑的过程中，香博认为我们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1. 中国日渐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是否会不可避免地损害美国的利益？
2. 围绕一系列区域问题，美国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一致或分歧？

如果我们能够认为，北京日渐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不会对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构成明显损害——我们发现美国和中国在区域问题上有着共同的重大国家利益和政策——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在重新崛起为真正的中央王国。然而，如果对美国而言，中国崛起为区域大国是个非胜则败的命题——中国谋求对美国有害的区域利益——那么中国就将成为中华帝国。

我们是否能设法在促进前者的同时制止后者？致力于研究全球和区域经济关系的学者认为，这确实是能够做到的。约翰斯顿指出：

全球化理论承认，未来限制国家主权的主要因素是他们的国内经济选择、国内文化选择乃至国内政治选择，以及他们的外交政策。这些因素也许无关乎物质实力分布，而在于一个国家是否向全球资本、资讯和技术流敞开大门。中国的分析人士大多也认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会在一系列政策领域对国家主权和独立地位产生负面影响。

研究区域经济关系的学者得出了类似结论。韩国知名学府延世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安炳炯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东亚各国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不尽相同。大体而言，经济要求在提高相互依存性，政治要求则在助长东亚国家内部和彼此间的民族主义。”

中国现任领导人显然认识到了这种局限性，正在努力制定妥善的政策对策。2003年11月，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按照“和平崛起”的构想，中国的未来将与其他区域大国休戚相关。温家宝说，“和平崛起”旨在“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为了打消外部观察家的忧虑，《北京周报》的一篇社论文章解释说：

西方的现实政治家认为，国家的崛起往往意味着走向霸权，从而注定会与现有大国发生对抗，像中国这样有过历史创痛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将对世界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有鉴于此，中国政府添加了一个限定词，以便让全世界了解自己的政治意图：和平崛起，目的是证明中国能够和平地崛起。

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措辞绝非出于偶然。中国牢记本国历史及一个事实：许多西方人认为，为了洗去昔日的屈辱，北京意图让邻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付出政治和经济代价。北京之所以宣布这项新战略，并且立即作出说明，就是为了防止外界得出此类结论。

这种先发制人的做法并不仅限于对记者的表态或者报纸社论。2005 年 6 月，郑必坚在华盛顿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要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不称霸、不争霸、不当头，也不当附庸’，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简单地说，北京并不谋求取代莫斯科成为华盛顿的全球竞争对手。或者，如同上海的一位中国教授所说的那样：“（和平崛起的）一个明确概念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中国不是经济竞争对手，而是代表着经济机遇。”一位加拿大教授提出了以下观点：“要探讨中国的‘和平崛起’，就必须了解其背景：该国成为了主要经济大国，具有全球影响力，所以不免令人担心其走向霸权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影响。不过，中国领导人显然无意扮演全球霸主的角色。”

那么，中国的目的何在？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检视中国行为背后的作用因素。首先，中国仍然对大国挑战自己主权的做法抱有深重疑虑。其次，中国仍然要维护自身主权，防止“屈辱世纪”的悲剧重演。最后，中国希望外界承认其获得了伟大强国的地位。

北京显然很可能将走向中央王国而不是帝国。在这种角色下，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主要政策领袖，但不会通过直接动武的做法来支配别国行为。北京不会派出人民解放军，而是会动用经济和政治力量。说到这一点，中国将重新成为国际社会当中广受尊重的“高级”成员，但不会让美国付出非胜则败的代价。中国缺少扮演全球霸主角色并为此付出相应代价的愿望，它别无选择，只能寄希望于（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的）现有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能够安然无恙并延续下去。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很重要	1
第二章 和谐世界	27
第三章 小康社会	63
第四章 中国的军力走向	92
第五章 思考台湾的未来	139
第六章 中国模式	167
后 记	180

>>> 第一章

中国很重要

我们最好把中国看作一个理论意义上的大国——在过去150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国家总有需要兑现的承诺，却又总是受挫……中国的重要程度大致相当于巴西对世界经济的重要程度。它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军事大国，但毫无政治影响力。

——杰拉尔德·西格尔

《中国重要吗》

1999 年

北京是否会成为华盛顿在全球“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这场争论已经尘埃落定。西方金融体系几近崩溃，美国军队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获得持久性胜利而伤透脑筋，华盛顿拿不出解决美国经济难题的政治方案——这一切都帮助北京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可敬的地位。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不断增强，积累了2.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简而言之，中国来了，美国必须学着接受这个地位相当的新伙伴。

我们对这种假设有多大把握？无论如何，就在短短10年前，作为美国外交学会首要出版物的《外交》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醒目的标